

《翁心存日记》所见《清宣宗实录》版本考

谢 贵 安

《清实录》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典籍,其学术价值日益受到学界重视,但对其版本的探讨,多集中在前三朝实录^①,对中后期以及整个实录版本的研究成果尚少^②。本文拟通过对《翁心存日记》(下文简称《日记》)的梳理和分析,厘清翁氏校阅之《清宣宗实录》的版本属性,并由此窥探整个清代实录的版本及纂修问题。

一、《翁心存日记》与《清实录》修纂

翁心存(1791-1862),字二铭,号邃庵,江苏常熟人,道光二年(1822)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。后入直上书房授书。历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,调户部。三十年(1850)二月二十日,“内阁奏请派实录馆官”,奉旨任命“翁心存充副总裁官”^③。六月四日,翁心存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,但仍兼实录馆差事。咸丰二年(1852)四月,翁氏代替出差的杜受田接办稿本,七月,以工部尚书兼任实录馆总裁官,专勘稿本。咸丰六年正月,转任国史馆正总裁。十一月,实录馆议叙,因翁心存“在馆四年续办稿本,悉心纂辑”,其孙监生翁曾源被赏

①神田信夫:《关于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》,载《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3年;齐木德道尔吉:《关于康熙本〈三朝实录〉》,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3期;徐丹俔:《〈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〉康熙重修本辩证》,《北京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1期;达力扎布: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版本浅议》,载《满学朝鲜学论集》,中国城市出版社,1995年;庄吉发:《清太宗汉文实录初纂本与重修本的比较》,载《清代史料论述》(一),台湾文史哲出版社,1979年;白新良:《康熙朝修太宗、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》,载《清史考辨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;孟森:《清世祖实录初纂本跋》,载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(上),中华书局,1959年。

②谢贵安:《〈清实录〉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》,《史学集刊》2008年第2期;谢贵安:《清实录馆藏版本考》,《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》(台湾)第40期,2008年;杨立红:《盛京崇谟阁本〈清实录〉皮藏浅述》,《历史档案》2011年第4期。

③翁心存著、张剑整理:《翁心存日记》(第二册)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784页。本文所引《翁心存日记》如无标注,皆出自该本。

给举人。是年冬,兼翰林院掌院学士,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,寻调户部。八年,充上书房总师傅,拜体仁阁大学士。九年,辞职。同治元年(1862),入值弘德殿,偕祁寯藻等教授穆宗。七月,接替已故的桂良担任实录馆监修总裁官。是年冬卒,优诏赐恤,赠太保,入祀贤良祠,谥文端。翁心存有四子二女,长子同书,字祖庚;次子同爵,号玉甫;三子音保,早殇;四子同龢,最幼,排行第六;长女寿珠,字绎龄;二女璇华,又名端恩,字纫卿。与翁心存同修《宣宗实录》的,还有其“六儿”翁同龢。

《日记》始于道光五年(1825),终于同治元年(1862),其中记载了《宣宗实录》开馆与修纂的过程(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六年十一月)。翁氏从开馆起至咸丰六年(1856)正月止,一直在实录馆中从事稿本校阅工作。即使离馆后,仍然持续对实录馆的活动进行记述。该《日记》手稿现存二十七册,间有缺损,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,近由张剑整理,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,共五册,其中第二、三册记载了清实录馆的运作情况。

翁氏《日记》中反复记载了他所校阅的《宣宗实录》诸种版本,有恭阅本、黄绫正本和红绫正本等。为弄清这些本子的属性,有必要对《清实录》的宫藏版本情况作一介绍。

清代承袭明代制度,实录修成后抄成数份,藏之宫中,秘不外传。是故直至1924年,紫禁城中都完整地尊藏着《清实录》的四种版本,加上盛京故宫崇谟阁藏本,共五种本子。早在嘉庆十一年(1806),仁宗在一份谕令内便提到过《清实录》的五种宫藏本:“现在恭纂皇考《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将次告成,因思朕每日恭阅之黄绫本,经馆臣编校进呈,间有体例不合、纂辑舛漏之处,均经朕随时指示,敬谨订正。至尊藏大内及内阁、皇史宬,并恭送盛京尊藏本四分,均系未经呈览,卷帙繁多,恐尚有讹误之处,不可不详慎校勘。”^①其中所谓的“黄绫本”实即恭阅小黄绫本,“尊藏大内”本实即乾清宫小红绫本,“内阁本”即小红绫内阁副本,皇史宬和盛京“尊藏本”即两部大红绫保藏本。这表明,至迟在嘉庆十一年,《清实录》已形成了五部宫藏本。民国时,故宫博物院成立后,清理出藏在北京皇宫和盛京故宫崇谟阁的各种《清实录》版本,竟与仁宗谕中提到的版本完全一致。1984-1987年,中华书局在整理出版《清实录》时,指出上述两京宫藏版本,除内阁副本散失殆尽外,其它的本子大都存在:

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,开始清点实录,所见太祖、太宗、世祖(以上三朝实录为雍正、乾隆间校订本)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、穆宗十朝实录满、汉、蒙文本各有四部。另外,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、汉文本各一部,共计满、汉文本实录各五部。蒙文本实录各四部。这

^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(第十一册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945页;又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七二,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己卯,中华书局,1986年。

五部汉文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,被称为大红绫本、小红绫本、小黄绫本。大红绫本两部,一部收藏在皇史宬,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;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,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。小红绫本两部,一部收藏在乾清宫,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;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。小黄绫本一部,收藏在内阁实录库,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^①

然而,这五种馆藏版本是怎样形成的,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,则需要《日记》提供详细的史料予以证明。

二、《翁心存日记》所载《宣宗实录》版本名目

翁心存在宣宗实录馆中先后担任副总裁、专办稿本副总裁和专办稿本总裁官。《日记》中记录翁心存校阅的《宣宗实录》本子名目很多,计有“稿本”(7次)、“恭阅本”(50次)、“恭本”(3次)、“正本”(24次,除去“红绫正本”1次和“黄绫正本”2次,剩21次)、“红绫正本”(1次)、“黄绫正本”(2次)和“黄绫本”(11次)等。这些纷繁的名词各自指称的是何种本子,各本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?为考察方便,特将《日记》中所记载的校阅过程及对象列表如下:

《日记》所载所校《清宣宗实录》版本一览表

校阅(或所载)日期	实录版本	册数	备注
咸丰元年正月十一日	恭阅本	3	实录馆收掌官、内阁中书联奎始送恭阅本三册来
咸丰元年正月十二日	恭阅本		以恭阅《实录》事体尤重,遂不起局,午正阅竟,卷一、二、三共六签。
咸丰元年正月廿四日	恭阅本	2	午正一刻退直,恭阅《实录》第四、五两册
咸丰元年正月廿五日	恭阅本	2	午正一刻退直,恭阅第六、七两册
咸丰元年正月廿七日	恭阅本	5	午正一刻退直,恭阅《实录》五册
咸丰元年二月一日	恭阅本	5	午正一刻退直,恭阅《实录》五册
咸丰元年二月二日	恭阅本	2	午正一刻退直,恭阅《实录》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七日	恭阅本	2	咸丰元年十月三日至十二月三十日《日记》散佚夜,寒,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十一日	恭阅本	2	至暮雪止,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十四日	恭阅本	2	夜,月皎。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十六日	恭阅本	2	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	黄绫正本 恭阅本	2	辰初二刻退值,至馆校黄绫正本,午正竣事。遂回城寓。灯下复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正月廿七日	恭阅本	2	未正二刻退直,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二月一日	黄绫本	2	辰正退,至馆校黄绫本,午正出,回寓,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二月三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
①《清实录·影印说明》,中华书局,1986年。

咸丰二年二月五日	恭阅本	3	申正仍回城寓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二月九日	红绫正本		夜,实录馆会奏缮红绫正本四分
咸丰二年二月十日	恭阅本	3	未正一刻回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二月十四日	恭阅本	3	午正入城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	黄绫本		退至馆,校黄绫本。
咸丰二年三月十二日	正本		午初二刻退直,至馆校正本
咸丰二年三月十三日	恭阅本	4	午初三刻退直,阅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三月二十日	黄绫本		辰正退直。至馆校黄绫本
咸丰二年三月廿三日	恭阅本	4	校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三月廿四日	恭阅本	2	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四月一日	恭阅本	2	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四月二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四月三日	正本		午初二刻退直,至馆校正本
咸丰二年四月廿三日	稿本		奉上谕:杜受田现在出差,恭纂《实录》稿本着派翁心存接办
咸丰二年四月廿七日	稿本 恭阅本	1 3	辰正到馆,阅稿本末一册,尚未定稿也。归寓,校恭阅本三册,二十四年春季。接芝农手也
咸丰二年四月三十日	黄绫本	5	已初至馆校黄绫本五册
咸丰二年五月一日		2	未正二刻退直,至馆校书二册
咸丰二年五月二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五月三日	正本	3	辰初三刻出,至馆校正本三册
咸丰二年五月八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。鹤溪所纂者殊多舛漏,穷日之力始得竣
咸丰二年五月十四日	恭阅本	3	生日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五月十九日	恭本	2	回寓庐,校恭本二册
咸丰二年五月廿二日	恭本	5	实录馆奏事,退,校恭本五册
咸丰二年五月廿三日	恭阅本	4	校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五月廿五日		7	实录馆园中公所尚未修竣,乃借阿实甫下处校书,辰正往,书尚未至。恭校七册
咸丰二年五月廿六日	恭阅本	6	辰刻复往校书,午初毕,三册。回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五月廿八日	恭阅本	3	辰初二刻退,阅恭阅本三册,为许云生所纂者,甚潦草,且句读亦多误,每册下廿余签
咸丰二年六月七日	恭阅本	2	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六月八日	恭阅本	3	未初一刻退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六月十三日	黄绫正本	7	翁心存母亲忌日,他上香遥叩后,仍于午初到园中实录馆公所校黄绫正本七册,申正回
咸丰二年六月十四日	正本	3	未初到馆,校正本三册,申正回

咸丰二年六月十九日	正本	2	已刻到馆,诸同人尚未到也,校正本二册,复与总纂、提调商略公事,出已未初
咸丰二年六月廿三日	正本	8	辰正到馆,校正本八册,申正二刻回
咸丰二年六月廿四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六月廿七日	恭阅本	3	午初二刻冒雨至东华门小寓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六月廿八日	正本 恭阅本	10 3	辰刻退至馆,校正本十册,至申正乃出。祁相国、朱桐轩皆在馆住宿。灯下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七月三日	恭阅本	4	校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七月十三日	正本	5	辰刻到园馆,恭校正本五册,午正回直庐
咸丰二年七月十四日	正本	5	辰正到馆,校正本五册,申初回
咸丰二年七月十九日	稿本		谕“翁心存着充实录馆总裁”;又谕“恭纂皇考宣宗成皇帝《实录》稿本,着派翁心存敬谨专司勘办”
咸丰二年七月廿一日	正本 恭阅本	10 3	辰初退。至园馆,校正本十册,酉初乃毕。灯下复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七月廿二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七月廿三日	恭阅本	3	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七月廿四日	恭本	3	夜,繁星满天,校恭本三册。
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	恭阅本	4	夜,浓阴蔽天,校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七月三十日	正本	6	辰正到园馆,校正本六册
咸丰二年八月一日	正本	6	辰正到馆,校正本四册
咸丰二年八月九日	恭阅本	1	实录馆奏启皇史宬,量度金匱尺寸。回寓,校恭阅本一册
咸丰二年八月十日	恭阅本	1	已正入署治事,午正回城内寓,校恭阅本一册
咸丰二年八月十一日	恭阅本	1	已初入署治事,午初二刻出,回寓,校恭阅本一册
咸丰二年八月十三日	正本	10	辰正二刻出,至馆恭校正本十册,至申正乃竣事
咸丰二年八月二十日	恭阅本	1	由西便门下园,未正一刻到直庐,校恭阅本一册。工部会同实录馆启视皇史宬,恭视金匱尺寸
咸丰二年八月廿一日	恭阅本	2	校恭阅本二册
咸丰二年八月廿五日	恭阅本	3	未初三刻乃饭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八月廿九日			两日馆上请校书,无暇也
咸丰二年九月一日	正本	5	辰正到馆,阅正本五册,申正乃出,至小寓
咸丰二年九月廿一日	恭阅本	3	已刻,校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九月廿二日	正本 恭阅本	10 3	辰正到馆,校正本十册。申正回,阅恭阅本三册
咸丰二年九月廿三日	恭阅本	4	校恭阅本四册
咸丰二年十月二日	正本	6	至内阁饭竣,偕同实甫大寇至馆,校正本六册
咸丰二年十月四日	恭阅本	1	未正回小寓,校恭阅本一册

咸丰二年十月五日	正本	4	辰正至馆,校正本四册
咸丰二年十月八日	恭阅本	3	夜校恭阅本三册。于是竣事至此,翁心存终于校完了所有的恭阅本
咸丰二年十月廿六日	黄绫本	7	已正入馆,校黄绫本七册,申正出
咸丰二年十月廿七日	黄绫本	3	午正入馆,校黄绫本三册,酉初出
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九日	正本	5	午正入馆校正本五册
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四日	正本	5	午正入馆,校正本五册,申正一刻出
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五日	正本	3	午初入馆,校正本三册
咸丰三年正月十八日	黄绫本		卯初二刻,实录馆请发黄绫本折,留中
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	黄绫本	6	已初到馆,校黄绫本六册
咸丰三年正月廿二日	黄绫本	2	午正入馆,校黄绫本二册,黄绫本四百七十△册已通行竣事
咸丰七年正月廿六日	黄绫本		实录馆于廿三日以黄绫本交武英殿

经过仔细分析,笔者发现以上众多的版本名词,其实只指称三种本子,第一是“恭阅本”,或称“恭本”,属于底稿,第二种是“黄绫正本”,或称“黄绫本”、“正本”,属于据底稿改正抄缮后的定稿;第三种是“红绫正本”,即据定稿抄缮成的尊藏本。由于翁心存负责“专司勘办稿本”,因此他日复一日连续校阅的“恭阅本”和“黄绫正本”,便均属广义的“稿本”,而“红绫正本”并非其职责分内之事,因此只是顺便提及,不属于“稿本”。

第一种翁氏校阅的《宣宗实录》的本子是“恭阅本”或“恭本”。咸丰元年(1851)正月十一日,午初退值后,“实录馆收掌官、内阁中书联奎始送恭阅本三册来”。这是第一次提到“恭阅本”。咸丰二年(1852)五月二日“校恭阅本三册”,八日“校恭阅本三册”,十四日“校恭阅本三册”,十九日“回寓庐,校恭本二册”,廿二日“校恭本五册”,用的是“恭本”名词,但意思与“恭阅本”相同。

第二种翁氏校阅的《宣实实录》本子是“黄绫正本”、“黄绫本”或“正本”。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,“辰初二刻退。至馆校黄绫正本,午正竣事……访淳甫相国,遂回城寓。灯下复校恭阅本二册。”六月十三日,翁心存于“午初到园中实录馆公所,即在澄怀园后西北隅,校黄绫正本七册,申正回”。“黄绫本”概念出现较“黄绫正本”为晚,实际上应为“黄绫正本”的简称。同年四月三十日,“已初至馆校黄绫本五册,申初乃出”。廿六日,翁心存“已正入馆,校黄绫本七册,申正出”。廿七日,“午正入馆,校黄绫本三册,酉初出”。咸丰三年正月廿二日,“午正入馆,校黄绫本二册”。在使用“黄绫正本”、“黄绫本”的同时,翁心存还使用了更简易的称呼“正本”。咸丰二年三月十二日,午初二刻退值

后,“至馆校正本”,四月三日“至馆校正本”。黄绫正本、黄绫本和正本是一概念,可从两个方面证实:其一,无论“黄绫正本”、“黄绫本”还是“正本”,均是在实录馆中校阅的,不能带回寓所和家中;其二,自咸丰三年正月廿二日,“午正入馆,校黄绫本二册,黄绫本四百七十△[六]册已通行竣事”后,《日记》再也没有出现“黄绫本”、“黄绫正本”和“正本”的名字,说明“黄绫本”即为“黄绫正本”和“正本”,皆随“黄绫本”的修竣而不再出现。

第三种翁氏提到的《宣宗实录》本子是“红绫正本”。咸丰二年二月九日,“实录馆会奏缮红绫正本四分,拣选得汉总校官二员、详校八员、清书阅校官二员、详校官十二员”。《日记》中只此一处提及“红绫正本”。“红绫正本”四份应该是指尊藏在皇史宬、盛京崇谟阁的两部大红绫本,以及尊藏乾清宫暖阁和内阁实录库的两部小红绫本。“红绫正本”与翁氏工作无关,故较少提及。

此外,“稿本”概念在《日记》中出现过7次。其实,“恭阅本”(恭本)和“黄绫正本”(黄绫本、正本)两种本子是翁心存日夜校阅的对象,属于他“专司勘办稿本”的工作范围,故均属于“稿本”范畴。一般而言,狭义的“稿本”概念是不包括“正本”的,但《日记》中又明确称“黄绫本”为“正本”,说明此处“稿本”是广义的概念,而且是个动态的概念——“稿本”修改好了即成“正本”。《宣宗实录》的“稿本”最开始是由周祖培专办,道光三十年(1850)五月八日,“有旨命周祖培专办《实录》稿本”,至八月六日,奉上谕:“实录馆稿本改派杜受田敬谨专司勘办。”^①这是因为周祖培“在刑部主稿事繁”,才“改命刑部尚书杜受田敬谨专勘《宣宗成皇帝实录》稿本”^②。当时皇帝谕内阁:“现在实录馆纂辑稿本,渐次成书,杜受田专司勘办,著毋庸赴刑部办事。”^③至咸丰二年(1852)四月二十三日,《宣宗实录》的稿本始由时任户部右侍郎的翁心存专司勘办,奉上谕:“杜受田现在出差,恭纂《实录》稿本着派翁心存接办。”^④二十七日,翁氏“辰正到馆,阅稿本末一册,尚未定稿也。诸公皆不在,遂冒雨而出,归寓,校恭阅本三册,二十四年春季。接芝农手也”。芝农即杜受田的表字。同年七月十九日,文宗在任命“翁心存着充实录馆总裁”后,又宣谕:“恭纂皇考宣宗成皇帝《实录》稿本,着派翁心存敬谨专司勘办。”至此,翁心存从副总裁一跃而为《宣宗实录》的总裁,并专办稿本。咸丰六年十一月一日,进呈仪式后,议叙实录馆臣,奉上谕:“翁心存在馆四年续办稿本,悉心纂辑。”可知从咸丰二年四月开始,直到他离馆前,所做的工作都是勘办稿本。

《清实录》有满、蒙、汉文之不同,翁心存校阅的《宣宗实录》“稿本”(恭

①翁心存著、张剑整理:《翁心存日记》(第二册),第818页。

②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一五,道光三十年八月乙丑。

③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一九,道光三十年十月丙寅。

④翁心存著、张剑整理:《翁心存日记》(第三册),第880页。又《清文宗实录》卷六〇,咸丰二年四月癸卯。

阅本和黄绫本)均为汉文本。咸丰三年正月廿二日,最后两本“黄绫正本”校阅完成,二月廿一日“《实录》汉文四百七十六册进呈完竣”,可知这“黄绫正本”是汉文本。另从专司勘办稿本的总裁周祖培、杜受田、翁心存都是汉官来看,《宣宗实录》的“稿本”应是汉文本无疑。再据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档案称“此次《宣宗成皇帝实录》汉本告成”,在拟定应行加赏名单中,有“汉提调官葛景莱,兼汉提调官贡璜,汉总纂官龙元禧、孙铭恩,帮汉总纂官龚宝莲、张金镛、宋晋,汉黄绫本总校官徐玉丰、孙鼎臣、李联琇,汉红绫本总校官杨元白、殷兆镛,汉纂修官宝璫、卓耘、郑琮诏、金鹤清、李载熙、袁芳瑛、刘书年、黄倬、邹俊杰,汉协修官边浴礼、宋宝珂此二员系与纂修官一体办书,汉详校官汤修、郭襄之、缪嘉谷、钮福厚、翁同龢、张汲、胡肇智、潘希甫”等^①,亦可证明先纂成的“稿本”是汉文本实录,至于满文和蒙古文本,显系之后翻译而成。

三、《翁心存日记》所载“恭阅本”与“黄绫正本”之关系

在厘清《日记》所载各本子的概念和含义后,还需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关系。诚如上言,无论是“恭阅本”还是“黄绫正本”,都属于动态和广义的“稿本”范畴,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

1. “恭阅本”与“黄绫正本”的关系,是底本与改进本的关系,但二者均属“稿本”范畴,始终处在修改和变动的过程中。“恭阅本”是“稿本”中的底本,纂修官编纂后,校对官(或详对官)进行校正,贴上签条指出错误所在及应当如何改正,然后交由翁心存校阅。翁心存当时身兼户部侍郎,在实录馆专司勘办稿本,不可能从头到尾地校对稿子,只能在校对官校对的基础上,进行审查和核定,即对交上来的稿本册中夹着的签条(贴黄)进行审核。咸丰元年正月十二日,他对前一天收到的“恭阅本三册”,“以恭阅《实录》事体尤重,遂不起局,午正阅竟。卷一、二、三共六签”。也就是说,他校阅的这三册(每册一卷,共三卷),上面共贴了六个签条。咸丰二年五月廿八日,他“阅恭阅本三册,为许云生所纂者,甚潦草,且句读亦多误,每册下廿餘签”。指的是校对官在许云生纂修的实录稿本上每册各贴了二十多个签条,三册共有六十多个签条。翁心存要对这些签条逐一审核,提出最终的方案和意见,再由誊录官抄缮成“黄绫正本”,进呈皇帝审阅,然后发回实录馆改正,最后据以抄缮成“红绫正本”四份。从“恭阅本”到形成“黄绫正本”的过程,其实就是稿本纂修的过程,包括两个环节:一是纂修官编成底稿,装订成“恭阅本”,由校对官(或详对官)初校后,交由翁心存校阅;二是誊录官根据翁氏意见改正,将“恭阅本”抄缮成“黄绫正本”,进呈皇帝审正后,发回实录馆,再由翁心存校正后抄缮成数种“红绫正本”。对此,《清仁宗实录》中有旁证材料:“实录馆

^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三册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70-72页。

纂办底本,总裁各官自当一体恭阅,至缮出正本,总裁等又不细阅,遽行进呈!”

①说明“恭阅本”是底本,“黄绫正本”是改进本,是从底本“缮出”的正本。此外,两者间差异还可以从翁心存校阅时所用时间上看出。“恭阅本”是比较初级的稿子,因此错误多、签条多,翁心存校阅时自然费时较多。从前表可见,翁氏校“恭阅本”最多只能校4册,一般都是校3册;而“黄绫正本”(黄绫本、正本)则是改过一遍的稿子,比较成型,错误较少,因此校阅时速度很快,一天竟能校完10册左右,而且常常如此。

2.“恭阅本”校阅在前,“黄绫正本”校阅在后,说明后者应该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改后抄缮而成。“恭阅本”在《翁心存日记》中出现的时间是咸丰元年(1851)正月十一日,“实录馆收掌官、内阁中书联奎始送恭阅本三册来”。而“黄绫正本”则是在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才首次提到:“至馆校黄绫正本,午正竣事。”比“恭阅本”晚了一年的时间。

3.“恭阅本”的地位不如“黄绫正本”高,后者似更为尊贵。《日记》中有些记载同时描述了翁心存对“恭阅本”(恭本)和“黄绫正本”(黄绫本、正本)的校阅过程,从中可见前者可以在下班后带回寓所和在灯下校阅,而后者只能在实录馆中校阅。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,“辰初二刻退。至馆校黄绫正本,午正竣事……遂回城寓,灯下复校恭阅本二册”;七月廿一日,“至园馆,校正本十册,酉初乃毕……灯下复校恭阅本三册”;九月廿二日,“辰正到馆,校正本十册。祁相国亦至。申正回……阅恭阅本三册”等。“黄绫正本”(黄绫本、正本)则与之不同。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,“至馆校黄绫正本,午正竣事”;六月十三日,“午初到园中实录馆公所,即在澄怀园后西北隅,校黄绫正本七册,申正回”;咸丰二年四月三十日,“巳初至馆校黄绫本五册,申初乃出”;八月十三日,“至馆恭校正本十册,至申正乃竣事”等。可见凡是作“黄绫正本”、“黄绫本”和“正本”的,均在实录馆中完成校阅,从不带到家中或寓所。

4.进呈御览的不是作为底本的“恭阅本”,而是修改抄缮后的“黄绫正本”。这可以《高宗实录》的修纂过程作为旁证。《高宗实录》从嘉庆四年(1799)二月开始,至嘉庆十二年(1807)三月十五日告成,在此期间,实录馆每成一册,都要进呈皇帝审阅。仁宗审阅的即是“黄绫正本”,而非“恭阅本”。如嘉庆九年二月,仁宗在审阅时发现实录馆“恭进《实录》内抬写之处,讹缮一字”,即严厉指出:“节次进呈正本,屡有字画讹错者,均经指出。至抬写字样,关系尤重。朕于恭阅时更为留心,一经看出错误,岂能不加惩处?乃此次于钦奉圣谕内应行抬写之处,讹书一字,实非寻常疏率可比。所有专办稿本之总裁内阁学士曹振鏞、纂修官编修叶绍本、覆校官编修周兴岱,著照所请交部严加议处。”结果专办稿本的总裁曹振鏞“降三级留任”②。可知皇帝审阅的是“正本”

①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四六,嘉庆十年闰六月庚戌。

②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二六,嘉庆九年二月乙亥。

即“黄绫正本”,并且此“黄绫正本”仍属于“稿本”范畴,因此惩戒的是“专办稿本之总裁”曹振鏞等人。以此推论,《日记》所载的“黄绫正本”(正本),也应是皇帝审阅的对象。文宗审阅实录的记载不多,但应该是未废祖制,此后同治和光绪等冲龄继位的皇帝,虽不能直接审阅黄绫正本,也都由大臣代劳。如同治二年九月,“派惠亲王绵愉、恭亲王奕訢、醇郡王奕譞、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祁寯藻、礼部尚书倭什琿布、兵部右侍郎伊精阿,每日在弘德殿敬谨详阅《文宗显皇帝实录》黄绫本”^①。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,“派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、奕劻、景寿,户部右侍郎翁同龢、兵部右侍郎夏同善,每日在毓庆宫敬谨详阅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黄绫本”^②。皆可证明皇帝审阅的是“黄绫正本”(黄绫本、正本)。

四、《翁心存日记》所载“红绫正本”

关于“红绫正本”,《日记》记载不多,却极具学术价值。

1.据《日记》所载,“红绫正本”并非等所有“黄绫正本”完成后才开始抄缮,而是在“黄绫正本”部分完稿时便开始着手抄写和校对。换言之,在进行“恭阅本”和“黄绫正本”的校阅工作期间,实录馆即已组织人员抄缮和校对四分“红绫正本”。咸丰元年正月十一日开始校阅“恭阅本”,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开始校阅“黄绫正本”,稍后的二月九日,“实录馆会奏缮红绫正本四分,拣选得汉总校官二员,杨元白、周学浚。详校八员,汤修、郭襄之、甘晋、缪嘉谷、钮福厚、翁同龢、张汲、胡肇智。清书阅校官二员,恩霁、德瑛。详校官十二员,和琨、志勋、□绮、阿克丹、锡奎、恩昶、毓桂、寿昌、恒升、受昌、广顺、锡佩。”这表明,“恭阅本”每修一部分,便校阅一部分,缮成“黄绫正本”进呈皇帝审阅一部分,然后发回实录馆抄写“红绫正本”一部分。据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档案载,“此次《宣宗成皇帝实录》汉本告成”,应依据道光朝的惯例先“加赏”在馆各员,并将“现在监修总裁以下各官,开列名单,进呈御览,伏候指示”。所开列的名单中,既有“汉黄绫本总校官徐玉丰、孙鼎臣、李联琇”,也有“汉红绫本总校官杨元白、殷兆镛”^③,说明“红绫正本”是紧随“黄绫本”之后开始抄缮的,并非等汉文本全部完成后,再抄缮成“红绫正本”。

2.从《日记》中可推知乾清宫小红绫本的进呈过程。表面来看,《日记》中仅记载了黄绫正本校竣并进呈的时间是咸丰三年,正月廿二日“黄绫本四百七十△[六]册已通行竣事矣”,二月廿一日“是日《实录》汉文四百七十六册进呈完竣”^④,并没有明确记载乾清宫小红绫本进呈的时间。但实际上《日记》中对乾清宫小红绫本的进呈是有所记载的,只是未提“乾清宫”和“小红绫本”。史

①《清穆宗实录》卷八〇,同治二年九月庚午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》(第二册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404页;又《清德宗实录》卷四三,光绪二年十一月壬午。

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三册),第70-72页。

④翁心存著、张剑整理:《翁心存日记》(第三册),第945、955页。

载乾清宫东西暖阁内尊藏着一份《清实录》小红绫本,由于是正式进呈本,因此清代历朝都派官员加以抖晾:“乾清宫尊藏《实录》、《玉牒》,旧例每年春秋二季,由批本处官员奏明日期,会同总管太监等敬谨抖晾”,自仁宗时决定“嗣后着间岁抖晾一次”^①。《宣宗实录》小红绫本于咸丰六年十一月尊藏乾清宫后,文宗于咸丰七年四月二十四日,朱笔圈出肃顺、载堪、许乃普、刘崐四人前往乾清宫抖晾实录^②。咸丰九年又派出抖晾人员文影、成琦、沈兆霖、钱宝青^③。据《日记》记载,咸丰六年十月一日,《宣宗实录》正式完成,“礼部奏《实录》告成、十一月初一日受书事宜”。十月三十日,作进呈的准备工作:“《实录》告成,时陈于保和殿,王公百官皆朝服恭集。卯初起,卯正至太和门外恭俟。辰刻龙亭三十六座自馆来,鼓乐仪仗前导,总裁以下各官蟒袍补服,俟亭行,王公皆朝服在金水桥北,百官在桥南,予领班。东向跪迎,俟过,随至太和殿下乃退。”文宗也从圆明园赶回紫禁城,准备举行受书仪式,“是日清晨上还宫”。十一月一日,进呈仪式正式开始。这天“五更风定云停,卯刻朝霞满天,旭日焕采,竟日晴暖。上行受书礼,予率儿子同龢于寅正三刻入内恭俟,卯正二刻上御太和殿,在馆人员进贺表,行礼退,复与王公百官庆贺致辞,行礼,各退。时卿云腾宵,五色绚烂,群臣拊舞,快睹嘉祥”。从时间上来判断,此次进呈的《宣宗实录》只能是乾清宫小红绫本,进呈后收藏在乾清宫的西暖阁内。《文宗实录》亦记载此次进呈:“王以下文武各官行庆贺礼,派出奉书之贝子、公及宗人府官,由保和殿,恭奉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至乾清宫安设。上诣香案前行礼。”^④也可证明这次进呈的就是小红绫本,进呈后便“安设”在乾清宫内。此外尚有其他旁证。道光四年三月壬辰,《仁宗实录》告成,宣宗批准的进呈仪式是:“前一日,总裁等官恭捧全书,送至保和殿陈设……其表文着于送书进乾清宫时,监修官一并送进。所有照看归架事宜,南书房翰林着派英和、黄钺、许乃普、田嵩年,总管内务府大臣着派穆彰阿、恩铭。至《实录》黄绫本,馆臣编次,按日呈览,均经朕详慎阅定。届时毋庸再行进呈。”^⑤宣宗明确指出,黄绫本是“按日呈览”均经他“详慎阅定”,因此不必“再行进呈”;“送书进乾清宫”一句,及派员“归架”一词,皆表明当时进呈的本子是送乾清宫尊藏的本子。以此类推,《宣宗实录》修成后,进呈时也应是“陈于保和殿”,那么进呈完后,同样会送入乾清宫“归架”尊藏,因此,它应该就是乾清宫小红绫正本。另,笔者还有一个反证材料,可以证明十一月一日尊藏的只能是乾清宫小红绫本。据《咸丰朝上谕档》可知,事隔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(第二十册),第87页;又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三〇三,嘉庆二十年二月戊寅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七册),第138页。

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九册),第207-209页。

④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二一一,咸丰六年十一月乙卯朔。

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(第二十九册),第101-102页;又《清宣宗实录》卷六六,道光四年三月壬辰。

数月,清廷又举行了一次非常详细的实录进呈仪式:咸丰七年二月四日,“恭进盛京尊藏、皇史宬尊藏并内阁尊藏之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首函各一分”,先在乾清宫东暖阁,恭设书案三张,又在保和殿设书案三张,设彩亭三座于实录馆门外,分别将盛京尊藏之《实录》首函一分、皇史宬尊藏本首函一分、内阁尊藏本首函一分放进一座彩亭中,将彩亭抬至太和殿阶下,再由纂修官将三份实录的首函捧到保和殿的三张内书案前分别放下。这时由宗室侍卫等官将实录捧在手上,由两位亲王引路,出保和殿后榻扇,来到乾清宫东暖阁的三张书案前,将实录分别放下。至巳刻,皇上御龙褂至乾清宫东暖阁,以次恭阅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,完毕后还宫。亲王率领宗室侍卫和总裁官等人,至东暖阁将实录捧出乾清宫,经过保和殿,“仍舁至实录馆安设”^①。这份题为“礼节”的文件令人歧误,以为此次进呈的便是尊藏乾清宫小红绫本,如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二一九载,咸丰七年二月丙戌(四日),“尊藏《宣宗成皇帝实录》、《圣训》于乾清宫,上亲诣行礼恭阅”。其实,这次仪式中出现的《宣宗实录》的版本,既没有乾清宫小红绫本,也没有“黄绫正本”,只有盛京本、皇史宬本和内阁本(即内阁副本)的首函,而且在皇帝恭阅后均被抬回实录馆安设。因此,笔者认为《宣宗实录》正式修完的时间是咸丰六年十月,十一月一日进呈的、标志实录最终告成的本子不是“黄绫正本”,而是藏入乾清宫的小红绫本正本。

3.《日记》记载了其余三本红绫本(皇史宬、盛京和内阁藏本)的尊藏过程。在乾清宫小红绫本进呈三个多月后,咸丰七年二月二十日,内阁和实录馆接到上谕:“《宣宗成皇帝圣训实录》尊藏皇史宬及内阁,所有典礼,各衙门敬谨预奏,至尊藏盛京本,俟玉牒告成,一并恭送”。尊藏皇史宬本,需要将此前尊藏在此的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、仁宗七朝实录先移至东配庑,等到进呈仪式结束后,再移回正殿,与新藏的《宣宗实录》统筹安排。三月二十日,“是日内阁奏皇史宬于四月一日卯时暂移七朝《实录》金匱于东配庑,请派大学士一员行礼,予列衔不递牌,亦未下园也。”(派裕诚)四月一日将七朝实录移出,四月六日便将《宣宗实录》尊藏于皇史宬:“是日尊藏《实录》于皇史宬,恭拜书函也。”显然,翁心存参加了这次仪式。笔者以为,此次尊藏,只是先安置于皇史宬中,四月十三日才是由皇帝参加的正式尊藏仪式。据《咸丰朝上谕档》载,四月二日内阁奉上谕:“本月十三日,朕亲诣皇史宬行礼,着先于皇史宬殿内设香案一,香炉一,香盒一,亲自拈香行礼,毋庸派人递香。御前大臣、御前侍卫随入殿门内,乾清门侍卫俱在殿门外。至实录馆总裁及礼部各员,均毋庸随往。”^②而到了十三日(甲午)那天,如期举行了尊藏仪式:“以尊藏《宣

^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七册),第42-44页。

^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》(第七册),第109页;又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二二三,咸丰七年四月癸未。

宗成皇帝实录》、《圣训》于皇史宬，上亲诣行礼。”^①此后，盛京本《宣宗实录》缮成，朝廷举行盛大的恭送仪式。咸丰八年八月廿四日，翁心存获悉“九月十二日上在东华门外彩棚、圣容、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前行礼”。廿五日，“复至朝房，以彭相国、周冢宰以现送《实录》到盛京，馆中乏员，（提调李德仪、邵亨豫出差，丁绍周入闱，钱鋈患病）欲国史馆派员助理也”，于是他“查国史馆前在实录馆者仅有徐申甫（嵩生）一人，托其转邀，（并校对周文俞、彭祖贤、贾致恩、管贻蓁等）”。九月八日，确知“克王等恭送圣容、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、册宝、玉牒至盛京尊藏”。由于要等新修的《玉牒》一起上路，直到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，盛京本才正式举行恭送仪式，文宗亲自参加：“辰初，上诣太庙，阅册宝毕，（执事人员皆朝服，起居注站班。）出诣东华门彩棚，先诣圣容前，行三跪九叩礼，复诣《实录》、《圣训》前行礼如初。王以下、侍郎以上皆蟒袍行礼，（讲官班备而未站）礼成。”^②由于内阁红绫本是副本（说它属于红绫正本四分时，是相对于“稿本”而言，相对于皇史宬、盛京本而言，它只是副本。前人已有结论，兹不赘），因此并未举行值得书写的尊藏仪式，无论是《上谕档》还是《日记》，皆无记载。

总之，《翁心存日记》记载了《清宣宗实录》的修纂过程，对考证该实录乃至整个清代实录的版本问题，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

①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二二三，咸丰七年四月甲午。

②翁心存著、张剑整理：《翁心存日记》（第三册），第1350-1356页。